2019年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结束后，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5项，总数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世界遗产大国。这促使中国科技工作者重新审视和思考自身位置与责任，思考如何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领域内，助力中国作出世界遗产大国应有的贡献。

一方面，中国有着过硬的自然遗产资源；而另一方面，在发掘遗产价值时，又显露出缺少全球比对经验的短板。

自然遗产申报 促使科学家具备全球视野

齐 欣 段易成

视野较窄 参与较少

做好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不仅需要极强的科技手段支持和数据支撑，还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作出准确的对比分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申报自然遗产热情很高，但缺少全球视野。

“这个说来话长。”梁永宁是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更是老资格的中国自然遗产申报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总体来说，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主要难点，是进行全球范围的对比分析，从而判别是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从全球视角和多个维度综合评判一个区域是否具有世界遗产价值，要依靠具有申遗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由于参与国际项目不多且了解不深，在自然遗产申报过程中，有些专家不能做出准确、深入的国际对比分析，进而影响到价值的客观判断。”

“在这方面，IUCN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梁永宁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自然领域的官方咨询机构，对《世界遗产名录》的新遗产提名地进行评估，监测已列入名录的遗产地保护，并为遗产地管理者、政府、科学家和当地社区提供支持、建议和培训。

朱春全曾担任IUCN驻华代表，他认为，中国会员和专家在IUCN的参与程度目前并不高。

目前，IUCN由来自全球超过160个国家的1300多个国家会员、政府机构会员与非政府组织会员以及15000余名科学家组成。“从1948年成立至2016年，一共通过了1300多个提案，这其中由中国会员提出的极少。”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参与度的提升是个渐进的过程，但是目前其参与度与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热度不相称。朱春全回忆说：“2012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期间，共有183个决议和建议被讨论通过，但其中没有来自中国的提案。”2016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中国会员提了4个提案，2个因格式审查不合格被退回，2个获得通过，成为IUCN决议。“这才实现了零的突破。”朱春全感慨道。

马克平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也是IUCN亚洲区委员会主席。他说：“受IUCN邀请、到世界各地现场考察自然遗产候选项目的中国专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目前IUCN总部的工作人员大概有两三百人，但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深入剖析 挖掘原因

语言交流障碍是一个明显原因。马克平说：“很多中国专家不能用英语交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南亚、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语言能力要好很多，他们了解、参与国际事务更方便。”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专家对国际交流平台的认知尚不充分。马克平认为，许多人并不太熟悉IUCN，较少参与其中。

梁永宁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博导，住建部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参与了中国大部分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工作，先后担任“三江并流”“中国南方喀斯特”“澄江化石地”等项目专家组组长。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为中国世界遗产项目进行陈述。

马克平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IUCN亚洲区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科学顾问，参加了第1届（1994）、第4届、第6-12届和第14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近年来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在中国的发展。

朱春全

中国林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自然与文化遗产分会副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生态学、自然保护、生态系统核算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项目管理及机构发展工作。

2012年至2019年，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驻华代表。

闻 丞

2007年加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现为国家林草局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广泛参与国内的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与保护，涉及青海可可西里、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太行山等项目。

此外，一些中国专家对参与国际交流和IUCN事务不够重视，也是导致现状的原因之一。

国家林草局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闻丞指出：“要提升中国在世界自然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必须重视利用各种国际交流平台。”

根据朱春全的观察，还有许多中国专家并不了解哪些是国际上的优先领域。“中国专家很多是以个人研究领域和兴趣的角度参与到不同类群的专家组，缺乏宏观的战略布局。”

学术影响力不大和国际视野受限，都会影响中国专家整体表现。闻丞特别指出：“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领域的专家群体在整体科研工作者中占比太少。近一二十年参与自然遗产事业，做科研、保护、管理的专家还不够多。”他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自然遗产保护领域门槛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相关学科建设上的滞后性。

多方努力 扬长补短

马克平强调：“人才质量和数量很重要，活跃度、参与度也很重要。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的专家团队挺不错的。中国每次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基本都能成功，这就说明他们的前期准备和研究是比较充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申遗专家的全球视野开始提升。“在自然遗产的地质、生物生态方面，中国已拥有较大规模的专家团队——至少在国家委员会层面。他们对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把握较好。这也是中国自然遗产成功申遗的重要保证。”马克平补充道。

现在许多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都更加关注来自中国的声音。马克平对此感触很深：“其他国家想要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做什么。虽然这不等于他们完全同意或者跟随我们的步伐，但我觉得，这是从冷淡到积极交流的转变。这些证明中国在此领域正持续地融入国际社会。”

闻丞说，他感到进入21世纪以后，经历的中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了，专家和学术机构的联系交往越来越密切。“国际社会知道我们目前在做什么，国际上的最新动向我们也能掌握。”

闻丞强调，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对中国的专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给予更多、更大支持。

对此，朱春全表示，中国整体实力在不断增强，要特别重视并鼓励青年专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让中国走向国际自然保护事业的前列。

“要想让更多人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在政策方面进行适当调整，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去推进。”马克平认为，政策鼓励和专家责任感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多的中国专家参与国际事务并发声。“比如说，在经费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应有更大力度的支持。”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或来自网络）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景观。

两项目预备申请世界自然遗产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高原，是中国第二大流动沙漠，提名地“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位于广袤沙漠的中部。密集分布的高大沙山之间，静卧着144个内陆湖泊。世界上最高的固定沙丘必鲁图峰屹立其中，形成了独特而壮美的沙漠景观。“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以世界自然遗产第（vii）、（viii）标准上报至世界遗产中心。除了独特的美学特征之外，该项目展示了不同的沙漠演化阶段和类型，在科学和保护上均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提名地“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由4个提名地片区组成，分别是盘县动物群、兴义动物群—乌沙、兴义动物群—顶效和关岭生物群，以世界自然遗产标准（viii）上报至世界遗产中心。三叠纪大约距今2.5亿年前，是古生代生物群消亡、后现代生物群开始形成的过渡时期。当时的贵州还是一片海洋。

贵州三叠纪化石群拥有超过41种海洋爬行动物的化石以及大量的海百合类、鱼类、菊石、双壳类等化石，展现了从中三叠世浅海生态环境至晚三叠世较深海环境演化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和保护价值。

“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的化石样本。

2019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版各国申请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其中涉及自然遗产项目的总计有18项。对于中国来说，最明显的变化是新增了3处申遗点：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贵州三叠纪化石遗址群和贵州黄果树风景名胜区。

3项自然遗产地进入申遗预备名单

陈雨兵

贵州黄果树瀑布。

黄果树景区拟申报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黄果树景区以（v）（vii）（viii）标准，拟申请文化和自然双遗产。黄果树景区提名地包括黄果树片区、格凸河片区以及屯堡片区。黄果树景区包含500米垂直高差范围内成因不一、大小不等、风格各异的九级梯状的密集瀑布群的绝妙现象。宏伟巨大的瀑布、梯级瀑布群、洞穴群和天生桥相结合的地貌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罕见；黄果树风景名胜区还是中国布依族、苗族文化和喀斯特地区文化发展的典范，是人类与喀斯特自然环境互动的代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

当地布依族、苗族文化，表达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真实性。